

隨州文化探源

SUIZHOU WENHUA TANYUAN

王文虎／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随州文化探源

王文虎／著

SUIZHOU WENHUA TANYUAN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州文化探源 / 王文虎著.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71 - 0383 - 7

I. ①随… II. ①王…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史—随州市 IV. ①K29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403 号

责任编辑: 少 云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6.25 印张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0383 - 7

自序

本书虽然是研究随州地域文化的，但我不希望读者将其视为简单的“地方知识”。

随州文化在其发展中，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思想高度。本书将向读者展示，随州文化三次浪潮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前时期的宗教文化，达到了以人（文化英雄）为崇拜对象的高度，二是春秋早期季梁的历史观达到了民为神主、君忠于民的民本论高度，三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建立了以火为天之根的宇宙观，其天文学及神话体系都是由此根而生成的参天大树。这些思想，足以使随州文化在思想史中形成一个体系，我们称之为“随学”或不为过。所以，仅用“地方知识”这个范畴并不足以概括随州文化的思想高度，必须从思想史的视角对随州文化进行探源。

读者在进入随州文化迷宫之前，著者做这些提示或许不是多余的。是为序。

王文虎

2014年11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何谓“曾随文化”	1
二、随州文化的三种形态和“三次浪潮”	2
三、曾随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	7
四、曾随文化研究与随学	11
第二章 随州文化第一次浪潮	15
一、随州境内石器文化概述	15
二、新石器时代随州先民的宇宙概念	33
三、新石器时代随州先民的信仰、宗教与艺术世界	48
四、新石器时代随州先民的宗教意识	53
五、新石器时代随枣走廊先民们的社会形态	66
六、随枣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农氏世的对应关系	80
七、炎帝、神农氏及烈山氏与随枣走廊的文明温床	92
第三章 随州文化第二次浪潮	110
一、季梁其人	110
二、季梁其事	117
三、历代文献中的季梁	124
四、季梁思想探源	129
五、季梁思想内容	143

六、季梁思想与先秦诸子	150
第四章 随州文化第三次浪潮	165
一、曾国之谜	165
二、曾国的科学文化	177
三、曾国的技术文化	182
四、曾国的制度文化	187
五、曾国的神话系统	190
六、曾随文化的历史地位	195
第五章 随州文化的历史渊源	197
一、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看随州文化渊源	197
二、从曾侯乙墓的文化遗存看随州文化的渊源	201
三、南北文化在随枣走廊交融的线路图	204
四、随文化的早期和晚期选择	206
第六章 随州文化的本质特征	209
一、随州文化的特征分析	209
二、以和为乐:随州文化的内在本质	217
三、曾随文化的历史局限	221
第七章 随州文化衰落揭秘	227
一、曾随文化的“高开低走”及衰落表现	227
二、“程贞一问题”的指向	230
三、随从:不能抢占文化上游	232
四、侈乐:被淘汰出局的必然性	236
五、美铜:青铜文化中的先进内容无法与时俱进	238
六、轻“土”:缺少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的代表者	243
附录 王文虎眼中的神农氏与随州史前社会	248
后 记	251

第一章 绪论

曾侯乙墓以及擂鼓墩二号墓的发现和发掘,引起了学术界对随州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的强烈兴趣。叶家山古墓群的发现和发掘,进一步将人们对随州文化研究推向系统研究的高度。随州境内的文化遗存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为世人所瞩目。考古发掘的青铜文物对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科技史等领域提出一些重大而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各方专家、学者对它们的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掀起了“编钟文化热”。

不仅如此,随州上古为烈山氏活动区域。作为烈山文化发祥地的随州,自然就在人们文化寻根的视野里。随州历史文化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何谓“曾随文化”

随州文化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荆楚文化”是指“湖北区域文化”。“湖北”被称为“荆楚”,在湖北大地产生的地域文化当然是“荆楚文化”;狭义的“荆楚文化”是指“楚国的文化”,即“楚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我们可以简称之为“楚文化”。这两层含义,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楚文化”一定是“荆楚文化”;区别在于,“荆楚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因为“荆楚文化”这个范畴内除了“楚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外,还有属于今天湖北省所辖范围内其他区域文化元素,比如

本书所有谈到的“随州文化”。“随州文化”属于广义的“荆楚文化”，但它并不是“楚文化”，而是“湖北区域文化”体系中可以与楚文化并举的独立文化单元。

在湖北区域文化中，随州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体系，其本质特征在于南北兼容，是一种交互性的文化体系。随州地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历史上的南北经济、文化大都通过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而在随州交汇，具有十分明显的南北过渡的地域特征。如在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随州是北方农作物的南限，又是南方农作物的北限。“南北兼有”是随州农耕文化的独特景观。随州文化的形成与其南北兼有的文化空间组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不能说，随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其地域特征，但其地域特征必然构成其接受四面八方文化的优势，其发展也就表现出了交互性的文化特征。

本书将在后面的适当的章节指出，在考古学界早就有专家以这一观点来审视、研究包括随州在内的随枣走廊文化遗存了。我们可以认定在随枣走廊，主要是随州地区，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供人们进行研究的“随州文化”。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随州文化”这个范畴所包括的内容应该十分广泛。因为随地是鄂、厉、唐、随（曾）四都珠联之域，所以随地的文化当为四国文化的总和。不过在这四国中，目前除了文献中的随国即考古发掘中的曾国外，有关鄂、厉、唐三国的史料，在故籍中大都语焉不详，且地下发掘亦不甚丰富。研究的条件还不甚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随州文化”，主要是指“曾随文化”。

二、随州文化的三种形态和“三次浪潮”

（一）随州文化的三种形态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首先从形态学的角度将随州文化划分为三种形态。

1. 始祖文化形态

它是随州史前时期的历史文化，核心内容是炎帝神农氏的神话与传说。它对随州文化有深刻的影响。神农故事在随州民间世代口耳相传；官方也以志书等形式，积极整理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资料，随州人认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是“诞圣之地”。

2. 侯国文化形态

随州境内有十分丰富的中心王朝分封的国家，目前发现的有鄂、厉、唐、随（曾）四国。

鄂国墓在随州的发现时间是2007年。其羊子山墓地四号墓中出土鼎、簋、盘、提梁卣、尊、觶、盃、甗、爵、方彝等共27件鄂国青铜器，根据器物特征和铭文记载情况分析，属于西周早期墓葬。其中，有14件上面带有铭文。有一件噩侯提梁卣的盖内有铭文二行5字“噩侯乍旅彝”，还有噩侯方彝、噩侯盘、噩侯鬯等，上面都铸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器物的主人就是噩侯。这组器物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的周康王、周昭王时期。如果羊子山四号墓就是噩侯墓的话，那么，这个噩侯本人就是西周早期偏晚的噩国国君。这些为我们研究鄂国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厉国”又称“赖国”，在商代即已存在。它先臣服于商，周灭商后，又臣服于周。厉国的重要活动，在典籍和铭文中并不多见，其可查者目前仅6处而已。《汉书·地理志》云：“炎帝裔为厉国。”清同治《随州志》：“炎帝姜姓。姜姓之支国有十三，曰列曰赖。”这一血缘关系充分说明随州境内的确有烈山氏。炎帝神农文化属于传疑文化范畴，但姜姓厉国的历史却是信史。姜姓氏族在传疑时代有天下，而到了信史时期却走向衰落。厉国文化可以看作炎帝神农文化的余绪。

有关唐的记载在铭文与典籍中，同厉的记载一样甚少，涉及的唐侯只有唐惠侯和唐成公。随县唐镇境内的有关唐国历史的“活化石”甚多，如“唐王店（殿）”、“唐王河”、“唐王井”、“华宝山”、“华宝寺”等等，同时在唐王店周围的遗址中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等时代的陶器、青铜器、瓷器

及房基、增基、砖瓦，其中李家湾遗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从而佐证了唐王店及其四周早在西周即为人口集中的城邑。

曾国文化包括文献中的随文化和考古学中的曾文化两方面。随文化的亮点是季梁民本思想。曾文化跨度很大，从叶家山古墓群文物到擂鼓墩二号墓，从枣阳到随州，以曾侯乙墓葬所反映的文化为峰顶。相对于鄂、厉、唐等国文化，目前曾国文化最为丰富多彩，所以它构成我们研究侯国文化的主体。

3. 州县文化形态

楚灭随后，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随地或为县或为州或为郡，在大一统的格局下，随州文化总体上是低落的，李白说“尔来寂寂，无一物可纪”，也许很伤随州人的自尊，但事实就是事实。当然在几千年的州县文化中，随州也有闪光的时候，例如隋唐时代，“随”一度成为中国文化难以绕过的“中国符号”，可是随州文化并没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发展。

以上三种形态是不同的，古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形态区别问题。例如清人章学诚云：“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史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既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①但章氏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侯封之稟王帝，不异于后世之郡县也”。其实封建与郡县是有区别的，这个问题柳宗元已有讨论。古人虽然注意到了封建与郡县的区别，却没有注意三皇五帝与封建的区别。我们在研究随州文化时，既要注意三者的区别，又要注意三者的联系。

（二）随州文化的“三次浪潮”

以上三种形态体现的是随州文化在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层次。下面，我试图从随州文化前两个形态所达到的文化高度，从浪潮的视角，做纵向的形态分析。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357—356页。

曾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溯源，起于旧石器时代，其落幕期当在战国晚期。期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史前烈山文化（炎帝神农文化）、春秋早期的随国文化（主要是季梁文化）、战国时期的编钟文化。我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三次浪潮”。

1. 第一次浪潮：以炎帝神农氏为文化主体的烈山文化。

有关炎帝神农氏的史诗般的传说对随州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同治八年的《随州志》，在前志的基础上以《帝纪》的形式综合了各方面的资料，勾画出了一个炎帝神农的世系：神农名石年，或作石耳。神农母有侨氏，名安登。神农妃承桑氏，一作桑水，一作奔水。炎帝临，一作临魁。炎帝直，一作植。炎帝匡，一作来。炎帝居，母桑水氏，名听。炎帝克，一作扈，又作哀。炎帝魁，时风沙侯杀其箕文。炎帝榆罔，一作榆冈。榆罔犹袭神农之号，神农之号的宗教含义就是以人（英雄）为社稷主体。

从石年到榆罔，炎帝神农氏世并非风平浪静，如在炎帝魁之时就发生风沙氏杀其谏臣箕文的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共工和祝融、榆罔和蚩尤、黄帝之战。祝融和共工之争、榆罔和蚩尤之争发生在炎帝神农部族，属于“内乱”，但是黄帝与蚩尤之争却是“外患”。黄帝与蚩尤都使用了工具中的革命性因素——铜，但黄帝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推出一套仁义礼制之类的文化体系，而蚩尤则没能适应这一要求，正如《太平御览》所说：“黄帝以仁，不能禁止蚩尤。”没有形成“仁”之类的先进文化系统，就意味着，蚩尤没有掌握先进文化。历史教训昭示一个真理：任何一个族群或集团不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都要被淘汰出局，而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的也要被淘汰出局。

2. 第二次浪潮：民为神主的季梁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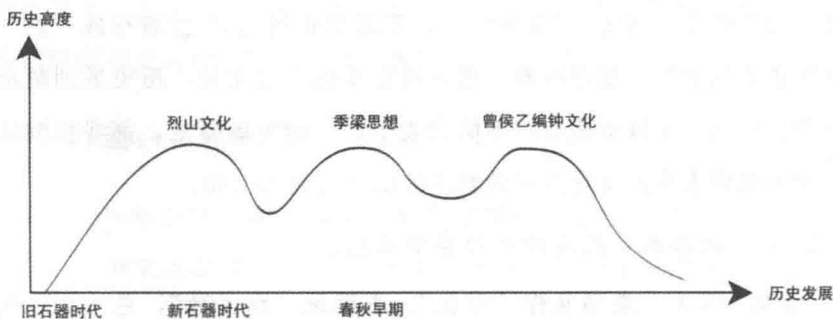
“季梁”其人，史书又作“季良”。季梁是“周王孙”，是“姬”姓后代，是周室的宗支。与随侯或曾侯有血亲关系，是随国某代君侯的兄弟，在《左传》中，他是德高望重的。

季梁掌握着随国或曾国的神权。西周晚期的“神”并没有彻底摆脱祖先崇拜的范畴，祭祀祖先实即祭祀神灵，而祭祀祖先是国家大事，不是一般官员所能承担的。历史上介绍季梁事迹的资料可能有很多，或者随国的史官对季梁的事迹与言论可能做了很多的记录，但可能因时间的漫长而遗失或者因战火的纷飞而毁灭。现在我们无法找到这些原始资料了。

季梁思想对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所谓道”的形式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思道之旅，完成了从季梁到子产的第一个螺旋，此时中国哲学在所谓道的思考方式中不仅对道的内涵有认知，而且对道的外延也有认知，还获得了一种以人道为出发点且以人道为归宿的人文主义特色。二是以“民，神之主也”的思想范式，为先进的春秋思想家们思考人神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三是率先提出上忠于民的思想，它虽然遭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的拥护者们的批判，但在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史上它或许是绝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思想超出当时以及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社会需要，他无法为春秋战国时期和以后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所接受。直到孙中山，上忠于民的思想才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季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早熟儿童。

3. 第三次浪潮：青铜巅峰的曾随文化。

在考古学层面上，曾国之曾的写法似乎经历从无“日”到有“日”的历史演变。



随州文化三次浪潮示意图

曾国的文化成就十分辉煌。在科技发展史上，它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其文化艺术成就也十分了得，不仅展示了其以火为天之根的宇宙观，而且还打造了一个以太阳（火）为核心的神话王国。

曾国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青铜文化不是随州文化的首创，而且在其开始，随人也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是随人（或曾人）却能后来居上，把中国的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随州客观上成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中心。从曾侯乙开始，随国历史文化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青铜文化中心开始从随州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了。

三、曾随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

（一）楚随并举

人们常常将华夏文化分成北方与南方、黄河与长江两大块。楚文化被楚学家们视为南方与长江文化的代表与北方并列。殊不知，在南方，在古代，曾随文化与楚文化是并举的。

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记载的“武王侵随”，就是这种并举现象的反映。当时二国的关系相当紧张。楚人对随的认识是，“汉东之国随为大”。虽然当时随之国势正在走衰，但是楚人认识到，如果随侯修政，那么也是“楚不敢伐”的。所以武王侵随时，首先“使蒍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而随人对楚的认识是：“天方授楚”。即认为楚之国势正处于上升时期，随未可与之言战，所以当楚“军于瑕以待之”时，随人则“使少师董成”。两国最终缔结了和约。可见在春秋早期的湖北地区，楚和随唱主角，保持了一种并举关系。随成为楚之附庸国可能始于公元前640年。据《左传》记载，这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过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已，而由人乎哉？”随以自己是汉东诸侯而不属于楚为由叛楚，最终被楚“取成而还”。大概从此时起，“随”在政治上与楚的并列并系，开始变成

附庸关系了。到了前 524 年前的楚吴长岸之战，楚王“使随人与后至者”守战胜品，一个“使”字，点明了楚随主从地位。不过，这里的主从关系是政治上的，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春秋至战国时期，随楚仍然能够保持着一种并列关系。这种并列关系已经深刻地烙印于中国文化本身了。例如有个成语叫“珠联璧合”。“珠”是指“随侯之珠”，“璧”是指楚国的“卞和之璧”。二者过去称为“随和”。旧《辞海》“随和”条目注释：“随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宝也，故随和并称。”此称可能始于战国时期的李斯《谏逐客书》：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騊駼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和氏之璧是楚文化的象征，随侯之珠是随文化的象征。李斯将随文化与楚文化的象征并举，此为世人认同，此足以说明，像楚文化一样，曾随文化是湖北区域文化中与楚文化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

（二）楚承于随

如果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则不难发现，曾随文化曾是楚人学习的对象，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随文化的精神营养，可谓“楚承于随”。

在神话传说中，随文化是楚文化的继承对象。炎帝神农文化是曾随文化第一次浪潮的主要内容，曾国国君对此深信不疑。例如曾侯舆说：“余，稷之玄孙。”稷是周人的先祖，同时是“神农”这一形象的主要原型。而祝融文化实即楚文化的源头。楚人则重视祝融。祝融，名重黎（简称黎），又称祝诵、祝和。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表明，楚人自认其为祝融的后裔。史载楚国别封之君夔子由于不祭祀祝融和鬻熊，被楚人视为大逆不道，惨

遭灭国之祸。被楚人尊为始祖之神的祝融其实是凤的化身。《白虎通义》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可见，凤与祝融是合一。祝融，在中国神话与传说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有人甚至将其纳入了三皇五帝的范畴，但是其重要性不能超过炎帝神农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

在这个世系中，祝融是炎帝的第五代孙。可见祝融是炎帝的继承者。这就意味着，炎帝文化是源，而祝融文化是流。后者是从前者而来的。

当然，在《山海经》里，也有祝融是黄帝后裔的记载，如《海内经》中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颡项。《大荒西经》则补叙为：“颡项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此说为司马迁所重视，《史记·楚世家》说：“高阳者（帝颡项），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炎黄文化是并举的。祝融或为炎帝后裔，或为黄帝后裔。无论其为炎帝后裔，还是为黄帝后裔，都不能改变祝融是炎或者是黄之继承者的事实。这就是说，与祝融氏相比，神农氏在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祝融次之，最终没有进到“人文始祖”的层级。

从信史上看，曾随文化是楚文化的学习对象。据《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楚人的信史时代虽然是从“鬻熊”开始的，不过真正被周室封君的却是熊绎。随国的历史可能比楚要早。随国，亦称曾国。随是他称，曾是自称。曾国的信史，可以见之于甲骨文。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际就有曾国了。周王命南公适镇守江夏而在随地创立曾国。叶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显示，西周早期曾国已经十分强盛，其文化成就十分辉煌。后来的曾侯乙编钟，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技术和文化准备了。而在其时，楚国正处在革衣蓝缕的创业过程中，其文化无法与曾国文化相比。楚人曾称其先为“文王之师”，然而这个“师”实际上只是周王的“办事

员”，地位很低。中原文化是楚人学习的对象，而楚人是通过随向中原学习的。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

在前面，我已经分析，公元前706年楚国势正旺，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楚人还是自觉其为“蛮夷也”，因而想通过随来“观中国之政”。有人将观中国之政解释为“介入中原政局”，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观中国之政”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所以楚文化中有大量曾随文化因素。著名的楚史专家张正明曾说，楚“观中国之政”曾从随国季梁的理论中受益。^①

楚人不仅通过随人观中国之政，而且还从中学到了随人的精湛青铜铸造技术。商周之际掌控长江中游有色金属资源的并不是楚国，而是曾国。传世的春秋早期的《曾伯簠铭》：“克狄淮夷，印（抑）燮繁汤，金导锡行”。这就意味着，从春秋早期上溯曾国掌控了长江中游的铜资源，所以春秋早期长江中游的铜器铸造水平以曾国为最高。^②在这种情势之下，楚国的青铜铸技术不能不受到曾国的影响。例如，在湖北当阳赵家垅楚墓群的西周晚期楚墓中出土的青铜鼎、簠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与同时期曾国青铜器几无区别，不过曾国还是技高一筹。因为受到曾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楚国在西周晚期开始铸造青铜器，并以乐器为主要铸造对象。现在所知的

①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71页。

②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73页。

西周晚期楚器，除赵家湖楚墓出土的鼎、簋外，如传世的楚公逆钟、楚公爱钟等都为乐器。在山西侯马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 64 号墓出土有编钟一套 8 件，据钟铭为楚公逆钟，尽管如此，和曾国相比，它不在一个层次上。曾侯乙编钟有大小 65 件，共重 2500 多公斤，其磅礴的气势至今举世无匹。曾国的青铜文化达到了世界青铜文化的顶峰，而楚国则只能在顶峰之下。

四、曾随文化研究与随学

在湖北地域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已然成湖北学界的“显学”，而曾随文化研究才开始起步。不过它在起步之初，就获得了美、日等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曾随文化研究，是具有国际性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

学术界对随州文化研究，在发展势头上甚猛。研究炎帝神农文化是随州地区的传统。清同治八年的《随州志》之“帝纪”，就是这个成果的记录。1990 年湖北学术界在随州举行了我国首届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1991 年 6 月随州市举行了“神农节”。进入 2000 年后，随州多次举办“寻根节”，推出了一批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对随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报告也相继问世，如西花园与庙台子、金鸡岭发掘报告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随州的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季梁思想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版了《大贤季梁》等专著，如今，季梁在随州地区已经家喻户晓。自曾侯乙墓发掘以来，有关它的专著、文集和报刊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达 300 件之多。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曾侯乙编钟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 1988 年出版）、《中国文物大系曾侯乙墓专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编著，大象出版社 1996 年出版）《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可以看出，学术界对随州文化进行研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爱好，它是许多人的共同爱好。